

（上接第五版）

也正是这个“拼命黄郎”，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、大面积、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。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，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，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。

“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，谁能这样坚持下来？”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，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：这个从一开始很不习惯、不习惯我们会开、不习惯我们讨论的人，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，才能引领协调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、这么大的项目？

黄大年的生命，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，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。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体，却却迎着迎向死亡。

2016年11月29日，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“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”。这天凌晨，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，黄大年又晕倒了。

“病人什么情况？”凌晨2点，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，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，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、脸冒虚汗的中年男子。

“在飞机上，他说胃很疼，就昏过去了。”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。

“他吃什么了？”

“他今天没碰上吃饭，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。”“可乐？”医生带着怀疑，想为他做初步检查，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醒来，睁眼看到医生掀开一摞，又赶紧擦了擦怀中的电脑，喘了一口气，又对旁边的同志说：“我可能不行了……我要是不行了，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，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。”

这台电脑，在黄大年眼中，比命还重要。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，这台电脑里装的，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。

这一晚，黄大人都抱着那台电脑，睡得很不安稳。早晨一睁开眼，他就撑着爬起来，扛土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，他却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，背着书包奔出病房，“还有个会，挺重要的，我得去。”

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宾馆的会议室时，有人下意识地看了看，黄大年怎么会迟到？也有人注意到，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不一样——

他的那件黄色呢子西装显得厉害，背也挺得不直，脸色泛着青黄，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。直到登台演讲，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，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PPT，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课题。回到长春，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。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，以免影响工作。还没出结果，他又跑去北京出差。

检查结果：疑似胆管肿瘤。

查一下下子槽了：这种病怎么会落到了黄老师身上？！

那天晚上，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坐了很久，直到止住哭泣，才敢接起黄老师不断打来的电话。

已近午夜，黄大年刚刚兴高采烈地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，又来询问一些工作的落实情况。于平强打精神回答着，却一遍遍在心底问着自己：“黄老师身体这么好，却出了这样的问题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……”

她想到他没白黑的作息，想到他草草的饭菜，想到他一杯接着一杯的黑咖啡，想到他敞开窗吹着冷风提神，想到他有几次腹部痉挛的奇怪发作，想到他越来越不爱下楼，越来越疯狂地工作……

她怨黄老师啊，每次劝他要注意身体，他总是走到窗边，炫耀式地举半杠铃说：“我们地质人，翻山越岭，走南闯北，身体好啊！”

她恨她自己，每次黄老师错过了体检，她都没有坚持己见，硬拉着他去医院……

她还想到了黄老师这两年时常挂在嘴边的话：“我是活一天，就赚一天。”

为什么，黄老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

一种可能的答案，后来是在他家中发现的——

黄大年离开后，王郁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。房子空空荡荡，从厅厅到卧室，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。走进卧室，打开衣柜，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衫。

“原来，黄老师不是没买，而是没时间打开。”王郁涵的眼泪刷地下来了。

她想起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，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，他总说“洗旧了的贴身，舒服”。

有一次，她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，她用手指了指，提醒黄老师。黄老师一看，圆圆的脸上咧出一个憨厚的笑：“没事儿，不耽误穿。”

正在她出神的时候，黄玲走了过来，眼圈红红的：“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黄玲拉着王郁涵走到床边，打开床头柜上的三个抽屉。打开的瞬间，王郁涵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——三个抽屉里，满满地堆着药：胆舒胶囊、六味五灵片……

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：凌晨二三点，也许更晚，张艳等得太久，已经睡下。黄大年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，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，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，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……

永远的“班主任”

“黄老师太累了，他只是睡着了。”每天，离开地质宫五楼，当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，乔中坤仍会下意识地回望一眼，507办公室的灯是不是亮着，那个头戴鸭舌帽的胖老头会不会从里面走出来……

这个高高个子、斯斯文文的男生，开始慢慢去接受一个残忍的现实：黄老师是真的永远离开了。4年前的9月，乔中坤揣着学校第二名的保研成绩单，忐忑地敲开了黄大年办公室的门。

终于要面见心中的偶像了。早在读本科时，黄老师给新生上的第一堂专业公开课就让乔中坤折服了。“你好，中坤，请坐。”没想到，黄老师直接从办公桌边起身走过来，招呼他坐在沙发上，还为他倒了一杯水。

面试的机会实在宝贵，这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攥着成绩单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瞧出他的紧张，黄大年主动给他讲起了自己的求学史和在国外工作的经历。然后，等到气氛轻松了，他才问起他的家庭情况、学习兴趣、业余爱好、理想规划，等等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乔中坤感觉黄老师就像家中长辈，已经非常周到细致地把他把未来的发展都考虑到了。最后，黄大年握了握他的手，微笑着说：“中坤，欢迎加入

我们的团队，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跟我做科研的日子会很苦很累，但一定很值得。”

很快，乔中坤就理解了什么是“很苦很累”。也理解了师哥师姐为什么打趣地说黄老师是典型的“一丝不苟的处女座”。

黄老师的笔记本电脑上，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夹。不出差的时候，他会到实验室，挨个询问每个人近期学了什么、想了什么、遇到什么困难。出差了，他就在机场、车站和开会间隙通过邮件查改作业，或者开视频会议在线答疑。

写一份研究报告，每个文字、每个标点，黄老师都要反复琢磨、逐个推敲；做一个PPT，从配图到解说，他也要精心指点，出差途中想到什么也会立刻发来。

有一次，有学生把一个科学术语的大小写弄错了，黄老师提出要修改，那个学生嘟囔了句“其实业内人士都能明白”，结果黄大年严厉地批评道：“大小写区别很大，会导致多重理解，科学容不得半点儿马虎，更不能有丝毫懒惰。”

对团队师生的论文，黄大年也非常上心。他亲自指导、逐字修改，但拒绝署名，“要记住，做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。要耐得住寂寞，坐得住冷板凳。”

有老师劝他，带学生差不多就行了，用不着管那么细。可他却认真地说：“我们的国家，太需要人才。现在多用点儿心，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师。”

在很多人看来，做科研可以出成果，带学生那是捎带手，可是黄大年心中，教师是他最看重的身份，因为他始终忘不了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那一段段似亲人的师恩。

初中时，由于父母被下放，黄大年被送到一乡村“五七”中学寄读，半年才能见一次父母。学校里有很多优秀教师，多数是身体情况不佳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清瘦、认真，尽心尽力地传授知识，温和儒雅地对待学生，像极了他的父母。

黄大年曾回忆说：“在这段经历中，我无意中接触到了中国式教父的形象。他们在求索知识的道路上坚毅、刻苦、顽强和清贫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。”

1978年2月下旬，经过4天3夜的长途跋涉，黄大年抵达长春火车站后，大老远就看见了举牌接站的老师。一位个头不高的老师一边关切地问他脚有没有因长途坐车而浮肿，一边帮他扛起行李一路送到学生宿舍。

这个从炎热的南方来到东北的青年，被老师们的热情包裹着。看到他没有棉裤，老师就连夜缝制；看到他基础薄弱，老师又帮他补课。在师生情谊的温暖中，他作为一个下放知识分子的后代感受着被尊重的快乐，也向着“为人师者”的崇高。

后来，人在异乡，他的英国导师也曾专程开车来实验室找他，邀请他一起回家过圣诞节。那些暖融融的点滴经历，不仅让黄大年感念了大半生，也让他深深意识到，一个优秀的科学家，应该是专业领域的领跑者，更要做学生成才的陪伴者。

2010年8月的一天，黄忠民来找他，语气有些迟疑，试探着问道：“大年，咱们学院想设置‘李四光’本科实验班，想邀请一些大专家担任班主任……”

“没问题，我愿意。”黄忠民心头一热，他没想到“已经把一分钟掰成几瓣用”的黄老师没有丝毫推诿，立马就应了下来。

新学期开学，“李四光班”的教室里先后爆出两次欢呼声。第一次，是黄大年神采奕奕、满面笑容地走上讲台，同学们被他“不凡的气度”彻底征服。第二次，是黄大年宣布为全班二十四名同学每人发放一台笔记本电脑。黄大年说：“要想探索前沿的科学，首先要掌握先进的手段。”

为了让学生们开阔眼界，他帮助他们订阅期刊，送他们出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，回来后有一些支出不可以报销，他当场就把票据撕掉了，然后自己掏钱补给学生。

黄大年的办公桌旁有两张椅子，两台电脑。倒不是因为“阔绰”，而是专门为學生准备的。学生来了，就坐在黄大年身旁，一人一台电脑，讨论清晰高效。有时，他碰见学生们有公式和计算方面的难题，就随手拉张椅子，手把手教起来。

每次，当他为学生讲完一道题、推导完一条公式，他常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的竞争对手在外面，要以国外一流高校的学生为榜样，追赶强者并超越他们。”

学生们常常觉得，黄老师是天底下最忙的老师。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都觉黄老师好像就在身边。

傍晚时分，如果走路传来又急又重的脚步声，学生们就知道，黄老师来了。他会一间一间屋子走过去，挨个询问大家吃没吃晚饭、有没有问题。

“绝不能亏待了这帮孩子，绝不能耽误了这拨人才。”这句话，黄大年常挂在嘴边。

地质宫顶楼冬冷夏热，黄大年给每个实验室配备了电暖气、电风扇，到了暑期就让妻子张艳给学生们煮绿豆汤，用大锅盛着送过来，入了冬又让张艳包饺子给孩子们吃；雾凇天，他给学生们买口罩，还教给大家正确的佩戴方法；怕孩子们想家，他几乎每个节日都让学生去家里吃饭，油烟过敏的他还亲自下厨做油焖大虾；出国时，他会带着两个空箱子专门给学生买礼物；接学术电话时会开着免提让学生们一起听；学生毕业回来看他，他也要请吃饭，问学业长进；谁没有对象，他也要操心，恨不得帮别人规划一辈子……

2014年的国庆节，黄大年又带同学们去净月潭徒步。风拂杨柳，碧波云影，醉人心神。黄大年背着相机，健步走在前面，一会儿给大家照相，一会儿又和男生赛跑。

他发现张代磊、张冲和周帅三个人默不作声地跟在大家后面，就悄悄来到他们身边，轻声对他们说：“是在为读博士的学费发愁吗？如果手头不够，先别向父母开口，我这边给你们垫上。”

第二天，王郁涵单独交给三个学生每人1万块钱，说是从学科学经费里节省出来的。第二年的学费也是这么解决的。后来，同学们申请了国家助学金，补齐了这些费用。直到黄大年去世，他们才知道，当年学费都是黄老师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垫付的。

黄大年发自内心地爱学生，一有时间就想和他们在一起。

2016年4月，为了给学生作报告，他从长春辗转北京、南宁出差，插空赶回长春作了报告，当天又赶回京。回长春待了几天，复去天津，第二天又回来给学生作报告，马上又赶赴河南……黄老师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马达。他哪里也爱他。可是黄老师越来越忙，大家多想和他多待一会儿，一起吃吃饭说说话啊！

2016年9月8日，学生们买了蛋糕、水果，跑到黄老师家，和老师 and 师母一起庆祝教师节。

学生们联名写了一张贺卡，被黄老师摆放在书柜中最显眼的地方。大家是这样写的：

亲爱的黄老师，在别人眼中，您是位儒雅而又有风度的大学教授、健康而不失风趣的闻名学者、博学多识精益求精的科学家。而在我们眼中，您更是传道授业、解疑释惑的严师慈父，幽默风趣、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，多才多艺、帅气爽朗的吉大“欧巴”。老师您辛苦了！

谁也没想到，那是黄老师度过的最后一个教师节。12月5日，黄大年住院前最后一次出差回来，照旧先回了办公室。

和往常一样，同学们都到他办公室门前排队问问题。排到王泰涵时，已是晚上9时多了，他探头一看，黄老师靠在椅子上，神态疲惫，就说：“老师您回家休息吧，我明天再问。”可黄大年拍了拍旁边的椅子：“没事，来吧。”

一个多小时后，4个问题解答了两个，黄大年说：“剩下那两个我再思考一下。你吃饭了吗？我请你吃饭吧。”王泰涵才意识到，从机场赶回来的黄老师还没有吃晚饭。

黄老师入院的第二天，点名让王泰涵过去。一进病房，打了一天点滴的他就从床上坐起来，招呼王泰涵挨着床边坐下。

“我这两天一直思考你提出的后两个问题，现在就在这儿给你讲讲。”边写边讲的黄老师手腕里还理着针管，胳膊也有些颤抖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

王泰涵眼眶发热，赶紧低下头做笔记。黄老师陆陆续续讲了40分钟，他一字不落地把记在了本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黄老师不说话了，王泰涵再抬头，才发现老师睡着了。

泪水再也无法抑制地夺眶而出，“敬爱的黄老师啊，您已经累成这样了，惦记的还是我们的学业……”

7年间，在黄大年指导的研究生中，共有14人获得省部级奖励，8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，3人获得“李四光奖”。在给学生们设计研究方向时，他总是考虑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发展前途，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起来。每个学生都像一块璞玉，被黄大年打磨着、打磨着。

他发现侯振隆喜欢推导公式，就给他买些专业书籍；他鼓励周月学好英语，建议她多看英文电影；他要了张代磊在线申请的账号和密码，对赴外交流提交的各种材料反复审核、录取结果公布了，他第一时间告诉张代磊，又叮嘱研究细节……

6月的吉林大学校园，有一年中最美的风景，这是黄大年最开心的时候，每年学生们毕业答辩后，他都要背上相机，拉着他们到处拍照。

今天，乔中坤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又一次来到507办公室，坐在沙发上与黄大年的遗像合了一张影。对着照片上微笑着的黄老师，他捧着毕业论文，哽咽着念了摘要，又念了致谢词：……

茶思屋通告栏里贴满了与您的合影，每天路过时我都会驻足停留，回忆您的点点滴滴；课桌上摆放着您帅气的照片，仿佛您就在我的身旁，督促着我勇往直前；

无数个夜里梦到您，梦中的您还是那样温暖慈祥，梦醒后泪水湿透眼角……

现在，黄老师不在了。他只记录了他们的青涩，却没能见证他们的成熟……

学生们去实验室学习的时间比以前更早了，晚上回宿舍的时间也更晚了，就连周末休息也是全员到齐。很多学生记得黄老师说“做什么就要有什么的样子”，按照他教的样子擦桌子、整理资料。

王郁涵每星期都会修剪黄老师办公室中的绿植。她记得黄老师偶尔看到哪片叶子枯了，都会不开心，他说花长得不好，不是花的问题，是养花的人没用心；事情做得不够好，也是因为做事的人没有做到全心投入……

原本以为黄老师走了，大家就散了，可是没想到，大家都决心要完成黄老师未竟的事业。

“等你们学成，再汇聚起来，就是未来中国科技的生力军。”黄大年将曾经每个人的专业特长、兴趣方向、性格特点，将自己置于未来研究的某一个点，最终汇成祖国下一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研人才网络。

现在，学生们就像一粒粒蒲公英的种子，撒播在世界各地。

有的学生根据黄老师的规划，赴外攻读国家需要的专业方向；有的学生进入全国各大科研机构，继续相关项目的研究开拓；有的学生接过黄老师的教鞭，放弃优厚的工作机会留在吉林大学任教……

聚是一团火，散似满天星。

黄老师说过的话，他们都记住了：

“不要有太多杂念，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”

“做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就行。要耐得住寂寞，坐得住冷板凳。”

“一定要出去，出去了一定要回来；一定要出息，出息了一定要报国。”

马国庆说像“机关枪”，黄大年多次给他辅导，告诉他这该怎么讲、那该怎么说。还给他分析、鼓励说：“你讲话快其实是因为你不自信，所以就想着快速结束这个事情。你做得很好，干吗没有自信呢？不要害怕，要表现得很有自信！”

有一次，有个学生对他说：“马老师你一上台，就像打了鸡血，特别精神，讲得也透彻。”马国庆听后呼吸一滞，缓了缓神，自言自语：“你们没见过我的老师，他讲课那才叫好，他的板书也漂亮。”

那天晚上，马国庆又一次梦到黄老师：他从书柜里抽出一沓新整理过的讲义，递给他，笑着说：“我把这个知识讲给你，不是只讲给你的，是让你讲给更多人的。”

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忙？

507办公室一张直通天花板的日历表占满了一面墙，上面字迹潦草，看得出记录者的匆忙。

从2016年4月29日开始，日历表上标注了红线，一直延伸到5月14日，中间清晰地写了两个字：英国。

那是黄大年回国7年后，破例给自己放的假。5月8日，是女儿黄潇的婚礼庆典。

4月26日，黄大年先赶到浙江大学开了一个评审会，28日又赶回吉林大学参加“千人专家”王献昌的评议会，终于在29日和张艳一起踏上旅程赶往英国。

这几年，黄潇一个人在英国完成了学业、找到了工作。现在，女儿要出嫁了！黄大年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动身前，他把唯一的一套正装西服找出来，前后熨烫一番，又挑出几件括括的衬衫，小心翼翼地收在旅行箱中。他发现脚下的棕色皮鞋褪色了，又翻出一双很少穿到的黑色皮鞋，细细擦拭，穿在脚上。

黄大年很满意自己未来的女婿。按照中国家长的传统标准，这个高大帅气、金发碧眼的小伙子“学历很

高、彬彬有礼、做人做事都挺踏实”。

为了凑爸爸的时间，黄潇和未婚夫把原定的婚期一改再改。每个周末，她都和爸爸热线联络，向他汇报筹备的进展。

5月8日，这天阳光明媚，在庄严的教堂，黄大年一套笔挺的西装，尽显儒雅风范。黄潇为爸爸和丈夫分别准备了湖蓝色的领带和领结，他们一家四口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，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黄大年从怀里掏出一块古董手表，小心翼翼地戴在女儿的手腕上。那是他的母亲在他结婚时送给张艳的礼物，他一直存着，就等着有朝一日传给黄潇。

婚礼进行曲响起，女儿挽着父亲的手臂，穿过众人祝福的目光，父亲把女儿的手放进女婿的掌心，将她的未来郑重托付。

接着，父女俩走下舞池，跳起了华尔兹。那是黄潇长这么大，爸爸第一次陪她跳舞。

看着潇潇幸福的笑容，黄大年不由想起过去的时光：潇潇出生那年国内发大水，他给她的名字加了三滴水，希望她此生过得潇洒大方。长大后，他带着她在剑桥的校园徜徉，在郊区的花园骑马；她觉得学中文很难，他答应课后陪她打羽毛球，哄着她去上中文班；她跟在他屁股后面修剪花园，又跑到张艳那边去收拾菜地；他最拿手的菜是肉末和鸡蛋炒在白皮，也是女儿最喜欢的……

望着爸爸增多的一白发，黄潇也在回忆小时候的事情：那时，他们一家就住在地质官的马路对面。一天晚上，妈妈和姥姥都不在家，黄潇就拉着楼里一个小伙伴一起去找爸爸。结果扑了空，再折回家，爸爸正在焦急地四处找她。那一次，一向和气的爸爸发脾气了，第一次用尺子打了她的手板。

高中时黄潇选修美术，第一堂素描课上完，爸爸就来指导了，那时候她才知道，原来爸爸遗传了爷爷的艺术天赋，他不仅是个体育健将，连绘画也是信手拈来。

考大学，黄潇瞄准了利兹大学，不仅因为父亲曾在那里深造，也因为有结构工程与建筑的双专业设置。黄大年对女儿的志向永远无条件支持，无论出差到哪里，她都会给女儿背回建筑书，如果在哪里看到精妙的设计，他也会拍下来给她发去……

后来，爸爸妈妈回到了中国，妈妈常说爸爸很忙，黄潇就担心他的身体。伦敦的下午，正是长春的凌晨，黄潇常给爸爸打电话：

“休息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爸，你该睡觉了。”

“我还在地质官。”

“那你开车回家路上小心。”

有好几次，妈妈告诉黄潇：“晚上我会睡一小觉，等你回来再起来给他煮面条。”黄潇听了，恨不能立刻辞职飞回长春，把爸爸从办公室拽回家，每天监督他吃饭睡觉。

可她也知道，爸爸的性格很犟，想他的事情一定会坚持。有几次，她飞回长春来看他们，一家人守在一起，爸爸会兴奋地讲他在国内进行的项目，讲中国又取得了哪些进展。

可妈妈也跟她讲过爸爸坚持背后的艰辛。妈妈说，有时候大年半夜不回家，她放心不下，到办公室看看，发现他就搭着件夹克，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她只能默默地帮他盖上被子，静静地待一会儿，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家……

妈妈说，她常在爸爸傍晚觉得疲惫寤食的时候，拿着切成小块的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日不见得的他。妈妈跟他说：“你吃点回去水果吧。”可爸爸总是说：“放那儿吧，正忙呢，你先回去。”妈妈有时候会坚持看着他吃完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。

妈妈说，她自己有时候实在熬不过，就叮嘱大年身边的焦健和其他同事多照顾照顾他。她跟他们说：“你们黄老师他平时作息没有规律，你们在他身边多提醒着点儿。”她听着妈妈道出的担心与忧虑，想起了父亲在她小时候跟她说过的话：“要记住，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女儿，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；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使自己优秀。”

爸爸回国之后，一家人聚少离多。可黄潇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家人在她婚礼上的那次团聚，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。

1月4日，手术后第21天。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，转氨酶升高，肝功能开始迅速衰竭，心电图出现停跳……

命运往往真是弄人——万里之遥，黄潇也正在临盆的阵痛中挣扎！

剧痛之后，随着哇哇啼哭，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。黄潇含着幸福的眼泪，虚弱地对丈夫说：

“拍一张孩子的照片，赶紧发给我爸爸妈妈他们。”

这时，黄大年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病房的柜子里。

黄玲听到柜子里的响声，看到微信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抢救室，把手机举到他的面前。

“哥，哥，你快醒醒，黄潇生，是个男孩儿……”黄大年的眼睛开始凸出，他刚刚失去了意识……

“哥……哥……你！你！快睁眼看啊，这是春伦，你的外孙啊！”

照片上，那个黑头发、圆脸蛋、圆鼻头的孩子，分明带着黄大年的几分神韵。

春伦，是黄大年住院期间为外孙想出的中文名字：长春的春，伦敦的伦。这是他最难忘、最喜欢的两个城市……

他曾说：“地质官刻有我的梦想，剑河却永远留下我的眷恋。”这里，有他的青春、他的母校；那里，有他的奋斗、他的骄傲！

春伦，浓缩了他的一生，又印刻着他的心迹。

他是多想亲口唤一声这个名字啊……

此时，微信群里传来一条消息：大家都快来医院！学生们正在食堂吃饭，扔下筷子，飞一样跑到医院，心急如焚地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。

突然，ICU那重重的门开了，医生说黄大年马上需要去手术室了，他的病一秒钟也就搁不得！

黄老师出来了，他被医生和护士推着，戴着呼吸机，眼睛半闭着，喘得非常厉害……学生们自觉地退后一步，手攥着手，静静为他拉起一道通向手术室的人墙。

他们多想扑上去，抱住心爱的黄老师啊！他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在心底呼喊：您一定要醒过来啊！您不能丢下我们啊！

1月8日13时38分，人们等来了那个令人万分悲痛的消息。

没有眼泪，没有声音，张艳就像失了心，听着医生最后的通报。黄玲大声哭着，过去扶住她，那瘦弱的胳膊瞬间冰透了她的手。

突然，张艳使劲儿挣脱开来，冲进了抢救室。那里，只剩她一个人了，她不能留他一个人在那冰冷的所在。

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，映在黄大年的脸上。所有

■ 责编 郭科

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

的抢救设施已经撤去，他躺在那里，面色平静。

“大年，你不能走，别丢下我！”张艳俯下身去，紧紧抱住他，把脸贴在他胸前，一遍一遍地哭喊着……

为了让他安心，她跟着他回来。为了让她开心，他在长春最美的南湖畔安了新家。

他为她做饭，她为他洗衣。他为她照相，她为他弹琴。夫妻那么多年，他还会当众牵她的手，为她唱生日的祝福歌……

这个拦也拦不住、拗也拗不过的男人啊，为什么就这样说走就走，不告而别。

从此，她再无苦等后的牵挂：“晚上不知道他会几点回来，做了饭他常等不来……”

而他，也再无奔波中的歉疚：“可怜她一再孤独守家，秋去冬来，在挂念中空守，在空守中老去……我6年前安慰她，再有一年就忙完，再有一年就是钢铁的生活节奏……”

“现在，黄老师再也用不上路了”——有学生悲痛难忍，在朋友圈中写下此刻的心情。

“不要发，潇潇还不知道。”等到黄玲想起的时候，黄潇却已经看到了。仿佛从天堂坠落地狱，她疯狂地拨打父亲的电话，想要知道这不是真的。

“为什么，爸爸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真相？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瞒着我？为什么我会相信你一直在出差……”

那个世上最疼爱她的人走了。

从此，白昼与黑夜，不再有分别。悔恨与思念，啃噬着时间。

“工作是工作，爸爸是爸爸。我和妈妈所失去的，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存在……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我的婚礼上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跳舞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太痛苦了！我好恨！”

可是她却不能哭泣，因为小小的春伦还在她怀里，还需要她的哺育。

时隔数月，黄潇带着春伦，回到长春。她要回到爸爸妈妈的家，在那里寻找一些他的影子。

她遇到过的每个人都告诉她：“你爸干了很多大事”“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”。

很多人问过黄大年：“你何必做到这个份上？”

他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答案：“你不知道啊，我出国就是从长春这个地方出去的，在外面漂了很多年，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机会。现在想回来，就是为了报效祖国。我什么职务也不要，什么待遇也不要，就是帮助祖国做一些事情。”

2015年1月，面对多所院校的极力争取，黄大年依然选择与吉林大学续签。

当时，大年只提了一个要求：再延长两年，在吉大一直工作到退休。刘财记得，续聘仪式上，大年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是带着梦想回来的，梦想和现实应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完美的结合。学校为我的成长和回归投入了这么多，团队也付出了这么多，我怎么舍得离开这片精神传承的归宿之地。这是我的母校，也就是我的归宿。”

现在，他找到了他的归宿。他在祖国度过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七年，他为母校奉献了自己的全部。这是怎样炽烈燃烧而又痛快淋漓的人生啊！